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20,000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20册

书号 11111·124 定价 1.55元

目 录

风雷激荡闽粤间

-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上)……………罗 明(1)
- 普宁暴动和惠潮梅工农革命军进军汝城……………李运昌(18)
- 附: 李运昌同志给广东省委党史办公室的复信
- 关于广东区委及各地党委一些情况的回忆……………李沛群(36)
- 广东海员的战斗历程……………刘达潮(61)
- 在广东革命洪流中
- 回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斗争(之二)
- ……………赖先声(100)
- 广东工团军和工农军的组织及其活动经过……………李 甫(129)
- 大革命时期广州油业工人的斗争和花县农民运动
- ……………侯桂平(144)
- 珠江三角洲第一个农民协会——藤子乡农会成立经过的
- 回忆……………萧一平(154)
- 我参加农民运动的经过……………黎 诚(160)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北江特委……………黄松坚(205)
- 中共北江特委团结改造国民党北江挺进纵队
- 的经过……………李学林(227)
- 斜阳浴血
- 一九二七至三二年斜阳岛武装斗争概述
- ……………湛江地委党史办等(244)
- 读《斜阳浴血》(西江月)……………温焯华(265)
- 苏兆征生平活动简表……………禤倩红(266)
- 温健公烈士传略……………胡提春(293)

风 雷 激 荡 闽 粤 间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上）

罗 明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春，第一次实行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大革命高潮。这一时期，广东省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策源地。一九二四年初至一九二七年八月，广东党的领导机构先后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同志任委员长，不久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时称中共广东区委（内部简称谐音“管东渠”），陈延年同志任书记，周恩来同志任常委兼军事部长。按中央规定：广东区委和两广区委一样，领导广东、广西和福建西南部以及香港等地的工作。当时在广东党区委和团区委领导下，我在福建的厦门、漳州和广东的广州、汕头等地进行过革命活动。现将当年的工作情况回忆分述如下，供有关研究党史的同志们参考。

一、在厦门集美学校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一年秋，我从广东省大埔县到福建省厦门集美学校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所创办）师范部读书。该校的规模很大，全校设师范、中学、水产、商业、女师和小学等部，学生共二千多人。校内设有科学馆、图书馆，图书很多，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书刊如“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等等都很齐全，同学们受这个进步思潮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学生普遍要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封建军阀混战。我进学校之前，该校的学生就曾为反对帝国主义强占厦门海后滩，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厦门、金门建立警察署，配合厦门各社团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受到学校当局的压制而发生罢课、反对校长的学潮。

一九二四年春，学生李文华乘船到学校读书，在岸边被驻军无故枪杀，激起学生们对军阀更加愤慨。

同年五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厦门压迫和殴打中国人民的罪行，学生会和全校学生准备集队参加厦门人民的示威游行，结果又被学校当局一再强行压制。全校学生十分愤慨，举行罢课，学生会也多次派代表与校长、校主交涉，要求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又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全校学生到校主住宅门口静坐请愿，整整坐了一天，要求撤换校长。黄昏时分，校长叶渊在二楼阳台上对学生讲，他已向校主辞职，请学生另举贤能当校长。第二天，学校当局宣布，开除学生会代表刘荆阴、杨望苏二人的学籍，随后又开除学生代表十四人，并宣布提前放暑假，要学生们在一个星期内离开学校，届时停止膳食，关闭宿舍。全校学生被迫离校。为了进行活动，当时还推举郑日辉、林仲等二十余人成立了学生会罢课委员会，设在厦门鼓浪屿。后来，学校当局勾结鼓浪屿的外国工部局，又将学生会人员驱逐出境。

当时，我是班代表之一，因病与全校同学一起离校回家。学生会干部在鼓浪屿被驱逐出境时，曾印发告同学书，号召同学们

到别处读书,以抵制学校当局的高压手段。于是,我决定到广州。七月间,我途经汕头,遇到了蓝裕业同志。我和他往来了几天,当他了解到集美学校闹风潮的情况后,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对的,是爱国行为。问题是学生会无核心领导,所以风潮以失败告终。他鼓励我回集美再读一年,继续搞学生运动,毕业后才走。他还说,广州人多,革命力量大,厦门做革命工作的人少,需要加强力量。我说,学生会已印发告同学书,叫大家不要回去,我是学生会代表之一,更不好回去。他说这个办法行不通,进步的学生走了,大多数中间的学生还是会回去的,这样反而对我们不利。他再三要我回去,还说即使我被学校当局开除了,也要设法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后来他就着重谈了革命形势和任务,他说:今年一月,孙中山先生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和宣布革命的三民主义,影响很大。现在广州已经成立革命政府,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还要把斗争的浪潮引向全国各省,使之深入发展,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要领导学生和各界青年进行革命斗争。他还对我详细谈了回到厦门后进行革命活动的办法,答应今后和我联系,并希望我能成为共青团员。我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回集美。

我回到厦门,听说同学们已纷纷回校,这证明蓝裕业的估计没有错。我回到学校后,又得知我未被开除,据说因为我离校后没有到鼓浪屿搞学生会工作。

我和同班同学李觉民商量,决定遵照蓝裕业的意见,在学校秘密建立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直接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杨匏安(共产党员)联系,登记表、证件、文件都从广州直接寄来。李觉民表示赞成。于是我们先从师范部做起,在各班秘密联系,吸收国民党左派成员,并向中学、水产、商业、小学等部

发展，不到三个月，就发展到一百余人。蓝裕业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很高兴。接着，共青团广东区委委任我为共青团通讯员。从此，我们就在两广区党委和共青团区委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广州经常寄来宣传刊物，如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等，对学生影响很大。师范部学生多数是贫苦学生，读书用功，也比较容易接受革命主张，所以在师范部左派的成员最多。

班里有左派组织，有的一个班成立一个小组，有的联班成立一个小组，全校则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我们左派联络活动对外称为“革命协进会”。

一九二四年冬，我们成立了星火周刊社，出版《星火周刊》，由我、李觉民、刘端生等五人负责。这个刊物内容，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中心，宣传革命理论，也谈及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前途等问题，很受欢迎。最初是油印，后改为铅印，一部分送阅，一部分出卖，一直出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最后一期就是“五一”专刊。

一九二五年春开学后，由左派组织发起，自下而上成立全校学生会，开展各种活动。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左派组织开会讨论，决定由学生会发出公告，准备举行追悼会。学校当局看到学生会的公告后，便以学校名义出了一个布告，这样，我们左派组织和学生会就决定按照学校公布的日期，联络师生员工参加追悼大会。在开会的前前后后，我们便借这个机会大力宣传国共合作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号召大家起来反帝反封建军阀，政治影响很大。

当时加入左派组织有三个条件：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共产

党的主张；二是拥护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和革命的三民主义；三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认识，我们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道理，一方面带动大家认真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独秀演讲集》等等。集美学校教师和学生很多，存在着各种思想意识，水产部有的教师宣传无政府主义，女师部有的教师宣传国家主义，他们还推销《醒狮报》。由于左派同志的大力宣传，后来大部分学生还是拥护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的。

五月一日，学生会又发起举行该校开办以来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外的筑路、打石工人也来参加，声势浩大。学校当局害怕学生又起来闹风潮，五月一日大会后几天，师范部李主任便找我去谈话，教务处孙主任也在场。李说，这次纪念“五一”节大会是你发动的。我说，我一个人怎样去发动？是学生会讨论决定的。他又说，不管谁发动，学校要你提前离校，可以发一个毕业证明，上大学也可以，去教书也行，以后补发正式文凭。我没表示同意。后经我们领导小组讨论，多数人认为，为了减少目标，还是要我先离校为好。同时，要我立即发函给广东团区委，请求赶快派蓝裕业同志来指导工作，并发展党、团组织。五月十日，我离开了集美。六月初，蓝裕业同志以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身份到了厦门集美，吸收了李觉民、罗扬才、邱泮林、刘端生、罗良厚、罗贤开、罗调金（后两人以后表现不好，离开了组织）等七人为共青团员，从此正式成立了厦门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是李觉民同志。这个共青团支部，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领导学生罢课，组织学生到各工厂、农村进行宣传，积极配合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

二、在广东大学期间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我离开集美后，决定先回家筹旅费，后到广州。我途经潮州返回大埔的茶阳、湖寮、百侯，直到枫朗，对沿途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都作了革命宣传。

五月三十日，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斗争，各地也开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六月十九日，香港举行十余万人的大罢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举行罢工，汇合成为省港大罢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声援上海“五卅”斗争。

“五卅”运动爆发后，我从大埔赶到汕头，因为汕头的航运中断，直到七月初才到达广州。据我所知，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省港罢工工人、市郊农民、青年士兵和学生十余万人，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示威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水兵和军舰的炮轰，当场死五十余人，重伤百余人。这就是沙基惨案。汕头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对省港罢工工人的压迫，反对屠杀游行示威的群众。

我从汕头来到广州，住在文德路大埔学会，与广东团区委取得联系。那时蓝裕业同志已从厦门回到了广州。我向区团委领导提出建议，因经济关系，我愿进短期革命学校。后来领导同意我投考广东大学，并从中参加学生运动。当时，蓝裕业同志任《工人之路》总编辑，他提出要我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采访员，并参加《工人之路》地方罢工新闻编辑。

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在广州东园，办公室是用竹篷搭成的。还设有膳堂和宿舍，规模很大。苏兆征同志任委员长，杨始开、罗醒任正、副秘书长。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工人纠察队也常在此集

合。周恩来、陈延年、邓中夏等同志常来参加会议。这里是领导省港二十万罢工工人与英帝国主义斗争的指挥部。我每日下午来此采访新闻，晚上便到全国总工会（设在惠州会馆）楼下《工人之路》编辑部参加编报。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越秀南路中央党部大门前下车时，被国民党右派收买的凶手暗杀。革命干部和群众闻讯后十分悲愤，我亲眼看到很多同志为此不幸事件而痛哭。当时广东区委号召省港罢工工人、各业工会工人、市郊农民、黄埔军校学生和各校学生组织起来，为廖先生开追悼会。送葬那天，人们沿途高呼“肃清内奸反革命”、“拥护三大政策”、“保卫省港罢工斗争胜利”、“保护工农利益，巩固广东革命的基础”等口号，要求政府采取严厉措施进行肃奸运动。在这次活动中，周恩来同志在报上发表了文章悼念廖先生，我读后也深受教育。

八月中旬，我参加广东大学的入学考试，后被录取到理预科。九月一日，我带着行李去上课了。

入学后，同学介绍我加入了新学生社。该社是在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下的学生进步组织。当时已由广州发展到各地各学校，在革命运动中起了应有的作用。我当了新学生社的社员，感到很高兴。过了几天，在该社负责人建议下，我在本校社员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厦门集美学校搞学生运动的报告。

九月十二、三日，饶君强（即饶卫华）和张穆两同志介绍我加入共青团，过了数日，又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就在党、团支部领导下搞党团工作和学生运动。

九月下旬，我得到党团上级领导的通知，要广东大学党团支部在全校统一开展学生运动，本校的新学生社可自行宣布结束，由全校学生选出学生总会，领导全校学生工作。

这里补充一件事，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并在广州成立反苏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广东大学的校长邹鲁也是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后来他还去参加西山会议。自从廖仲恺先生被国民党右派胡汉民收买凶手暗杀之后，广州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更加紧张。学生中也是如此。广东大学有许多社团，有新学生社、民权社，也有右派组织的社团，秘密组织的孙文学会。为使全校学生能统一在学生总会领导下进行活动，本校的新学生社举行了一个晚会，表演歌舞等节目。开幕前，社负责人宣布本社到此结束。新学期开学后，文预科陈尚友（后名陈伯达）曾来找我，说是集美同学。我说不认识，他说是我前届的同学，还说了一些联络的话。新学生社举行晚会时，他发现我是社员，过几日就叫我到他宿舍，当时，他和黄振家、刘鞠民、梁某等六人围攻我，说我是“卢布党”，禁止我与福建同学来往，并说不准我去厦门。我当即反对他们这些右派，并声明我是左派，不准他们诬蔑共产党。我还说，广州是革命政府所在地，你们没有权力限制我与福建同学往来。我斥责他们之后就走了。后来陈尚友在上海出版的《洪水》杂志发表一篇《反对帝国主义就要消灭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从此我才查清他是反苏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由此可见，当时一些国民党右派反对左派的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十月初，全校学生总会经过筹备后举行大会。主席团选出后，少数右派学生不满，指使三个女同学上台与主席团争吵，当时有三个左派女学生上去相劝，拉她们走开。主席团宣布学生会人员候选人名单时，台下少数右派学生又吵了，企图把会场搞乱。经过党团员学生事前串联做了准备工作，所以大多数学生都

镇定地坐着开会。可是不到片刻，少数右派学生又在燃放大爆竹，故意恫吓同学。那些右派学生被大家斥责后，只好大叫大嚷退出了会场。后来会议照程序进行选举，毕磊被选为学生总会主席，绝大多数学生表示拥护。

不久，国民政府宣布，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决心彻底消灭军阀陈炯明。广东大学学生会紧密配合做好宣传工作，使部分师生也参加东征，随军到了惠州，进而收复潮汕，直至取得完全胜利才返回学校。

十月下旬，共青团广东区委决定调我到宣传部当干事，要我上午在校上课，下午到宣传部工作。当时，杨善集同志担任区团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他要求我：一是管理内部参考书籍和整理报纸杂志，二是编印小册子和推销《少年先锋》，三是参加有关宣传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间，我看过很多参考书，也编了一些小册子，如《怎样介绍共青团员》、《怎样做好宣传工作》等等。杨善集同志对此很感兴趣。他曾在苏联留学，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他理论联系实际，常在《少年先锋》、《广东青年》、《人民周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也经常在干部或群众大会上讲演，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对我教育帮助很大。特别使我感激的，是他从苏联带回来送给我的三本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当时国内还买不到。通过学习列宁著作，联系实际，我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过国共合作时期党和无产阶级应巩固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之类的话，这引起领导同志的重视（上列中文石印本三本书，当时我从广东带到福建和中央根据地后，交给中央局用铅印出版）。

杨善集同志很重视厦门团组织的发展，也很关心厦门的建党

工作。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厦门大学学生罗扬才（共青团员）代表该校来广州出席全国第八次学生代表大会时，我向杨善集同志介绍了罗扬才的情况，后来杨和我便与学生代表会联系，并介绍罗扬才同志加入共产党，这是厦门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二六年一月，厦门小学教师李觉民（厦门共青团）以福建省国民党代表的身份，来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到那天，我又向杨善集同志介绍了他的情况，后来我们两人与代表会党支部联系后，又介绍了李觉民同志加入共产党，这是厦门第二个党员。按照党章规定，要有三个党员才能成立支部，后来我提出建议，把罗秋天（共青团员，也是共产党员）从广东大学调到厦门大学读书，杨善集同志同意了。从此，厦门有了三个共产党员，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成立了厦门第一个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的书记是罗扬才同志。

三、受命到厦门招收农讲所学员

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同志来广州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件大事。第一届至第五届农讲所，也是我党主办，彭湃、阮啸仙等同志先后任过所长，但学员招收面不宽主要是广东，其次是湖南，再次是广西和福建。第六届则要在全国各省包括内蒙等反动统治地区招收三百多名学员，改称为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广东区党委派了很多干部到各地招收学员，我被派到厦门。出发前，陈延年书记作动员报告。他认为，我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阶级一定要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

当时广东区党委委任我为特派员，主要是任务到厦门招收农

讲所学员，协助厦门党支部发展和整顿党组织，共青团广东区委也委任我为特派员，要我协助共青团支部，发展和整顿团的组织。厦门招收学员原计划分配十名，经我提请增加到十五名。当时厦门是反动统治地区，设有公开的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为一些右派把持，驻防海军部队看到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声势大，也就帮国民党党部做一些工作。省党部内还有一个委员与海军有密切联系。广东区党委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所以介绍我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联系，由部长林伯渠同志委任我为农民部特派员，到厦门招收学员。

我于二月间到厦门后，与厦门党支部商量，为了保证质量，根据广州的经验，首先举办党团员训练班。当时厦门党支部原有罗扬才、李觉民、罗秋天三人，以后又在集美团员中发展了几个党员，有刘端生、丘泮林、巫炳熹、谢如香，在厦门又发展了刘大业、阮山、庄醒人、巫玉霞、郑瑞生、洪敬钊、柯子鸿、严子辉等十几个党员，各个支部都选出了支部书记，厦门大学支部罗扬才，中山中学支部陈祖华，集美师范支部罗贤开，集美小学支部巫炳熹，育清支部郑瑞生，大中街工人支部柯子鸿，禾山农民支部严子辉，并成立了党的总支干事会，阮山任书记，李觉民任组织委员，刘大业任宣传委员，罗扬才任学运委员，总支领导厦门和集美各支部。共青团也成立总支，领导厦门和集美各团支部。厦门党团支部一开始就重视工人、农民、学生工作。工人支部书记柯子鸿，以联欢会和俱乐部的名义召集工人开会。农民支部书记严子辉也在禾山组织农民进行活动。并在各学校组织学生会。我们还以厦门道南女中为中心，成立妇女协会，校长王兆惠是国民党员，但他支持国共合作，因此也支持我们。

几个支部刚建立起来，又来了一个临时任务：广州国民党中

央通知厦门国民党临时省党部，要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福建省党部。党总支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广州的经验，我提出：党团总支应领导党团员积极参加国民党省代会的选举工作，争取左派能取得优势。当时，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中山中学都有国民党左派组织，“五卅”运动以来，厦门已建立二十个左派区分部，闽西乡间，经过集美左派回去活动，国民党左派党员永定县有六百多人，上杭县也有一百多。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厦门和金门有二十多个区分部，诏安张贞独立师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国民党党员有六百多人。两派对比，左派人数仍占上风，因此在通过议案和选举委员时，左派占了优势。罗扬才、李觉民、阮山等人被选为常委，当然我们也没有独揽，国民党右派和中派也有被选为常委的，如国民党中派“春生堂”老板郭礼宗也当上了常委。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正式成立后，因为其中有不少左派，所以北伐军进入福建前后，在工作上起了较大作用。

在招收农讲所学员问题上，我和党总支同志进行过多次讨论，又与厦门国民党省党部秘书温闽仙（左派）取得了联系，并于三月中举行了考试，经过评分，录取九名：朱积垒（集美左派，平和县人）、郭滴人（集美肄业，龙岩县人）、陈庆隆（即陈子彬，厦门中山中学学生，团员，龙岩县人）、朱文昭（龙岩县人）、温家福（上杭县人）、王奎福（上杭县人）、胡永东（集美左派，永定县人）、李联星（归侨职工，龙岩县人）、黄昭明（集美左派，诏安县人）。我们给这九位同志发了旅费，买好了到广州的船票，我还运他们上船。

招收学员原定十五个名额，因陈尚友（陈伯达）进行破坏，没有完成任务。事情经过是这样：陈尚友从外地回来，听到我来厦门招收农讲所学员，便叫厦门“春生堂”老板郭礼宗约我于三

月二十四日下午到他店里喝茶谈话。党总支同志认为，此人是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属中间派，可以争取，赞成我去。当我到了“春生堂”店里，老板接我到楼上会客室，刚坐下，陈尚友和他邀来的十几个人便先后大声发言来围攻我，说我是“卢布党”，责问我为何来厦门？为何还不走？我说我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招收农讲所学员的，任务未完成。后来他又辱骂共产党，攻击我个人。当时我也不客气地斥责他。我说，我是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反对你这种丑恶的语言和行动。接着陈尚友又指使他们一伙攻击广东国民政府，说国民政府勾结苏俄，实行专政。还叫嚷只有美国、菲律宾政府才是“自由、民主”。他还攻击三大政策，胡说广东的工商业家受我党和政府的摧残、压迫，企图蒙骗在场的商人。我说广东工商业家照常营业，成立了商民协会，和工农学生共同反帝反军阀，进行民主革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不容你们造谣歪曲。对陈尚友等人的无耻攻击，我一一予以驳斥。后来我就离座下楼了。“春生堂”老板送我出门口时，还向我道歉，说事前不知道陈尚友的阴谋。我回到厦门大学，党总支同志得悉，右派分子与海军勾结，阴谋迫害我。于是，党总支同志即刻送我到附近工人家里秘密住了六天，然后送我上船回广州。我到了广东区委才知道，陈尚友在厦门“春生堂”围攻我，与广州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是紧密配合的反革命行动。

四、主办干部训练班的前前后后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我回到广州，向陈延年同志汇报了在厦门招收农讲所学员的工作情况后，他说：三月二十日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比你厦门那边还紧张，你在厦门反动统治地